

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变化^{*}

孙慧敏 李 茜

摘 要：约旦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结构与现代结构在社会内部同时存在且相互交织。传统部落与大家族势力通过攫取国家的政治权力，实现了权力在上层内部相对稳定的传递。部落成员依靠家族与部落势力，依据亲缘与血缘关系，获取了现代中间阶层的地位，且实现代际地位传承。由于约旦存在大批巴勒斯坦难民这一特殊群体，巴勒斯坦人在融入约旦社会的过程中面临地位落差的问题，这导致约旦的双重社会结构更趋复杂。约旦现代化与海湾国家石油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结构中各阶层间的流动开辟了渠道。然而，约旦国内外政治与经济环境导致中产阶层仍面临向上流动的困难与向下流动的危险，其中阶层向下流动的压力易引发社会震荡。

关键词：约旦现代化进程；社会结构；部落政治；家族政治

作者简介：孙慧敏，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2016 级博士研究生（西安 710069）；李茜，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舆情与国际传播研究院副教授（西安 710128）。

文章编号：1673-5161(2020)01-0121-19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15ZDB06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约旦政权稳定性研究：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构建视角”（2019H002）、西安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区域国别研究专项项目“海合会成员国发展规划和一带一路对接”（18XWD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到西安外国语大学约旦研究创新团队的资助。

约旦的现代化建立在本国君主立宪政体与西亚地区部落文化的双重基础之上,在阿拉伯国家中具有典型性。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随着约旦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发展,约旦社会逐渐从以部落和家族控制为基础和基本运作机制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约旦传统社会主要由部落构成,社会结构相对单一,社会等级较鲜明。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约旦现代化进程伴随外约旦酋长国的建立而起步,并在独立后实现了较快发展。中东变局检验了阿拉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转型的成效。在此期间,约旦因其社会结构的稳定而未受到重大影响。因此,研究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演变模式、主要特征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阿拉伯国家关于约旦社会结构的研究中,约旦学者哈尼·胡拉尼(Hani Hourani)的《外约旦的社会经济结构》^①是关于约旦社会研究,尤其是农村社会阶层分析的代表性著作。同一时期的约旦学者萨义德·贾瓦德(Said Jawad)的《约旦农村的社会冲突》^②探讨了约旦农村社会结构导致的冲突问题。此外,苏莱曼·穆萨(Suleiman Mousa)的《约旦的社会变化》^③、纳伊姆·易卜拉欣·扎西尔(Naeem Ibrahim Zuhair)的《约旦当代社会事务》^④、穆罕默德·阿卜杜·凯里姆·胡拉尼(Mohammed Abdul Kerim Hulani)的论文《社会资本部落:对约旦社会部落忠诚的构成及其转变的社会学研究》^⑤都是专门研究约旦社会结构的重要文献。此外,埃及学者阿卜杜·法蒂勒(Abd Al-Fadeel)的《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结构及阶级构成》^⑥和艾哈迈德·穆萨·巴达维(Ahmed Musa Badawi)的《阿拉伯国家中产阶级的变化》^⑦都有一定的篇幅介绍约旦的阶级状况,也涉及约旦的社会结构变化。西方学者对约旦社会结构的研究,一般是运用西方学术理论着

① [约旦]哈尼·胡拉尼:《外约旦的社会经济结构》(阿拉伯文),贝鲁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研究中心 1978 年版。

② [约旦]萨义德·贾瓦德:《约旦农村的社会冲突》(阿拉伯文),贝鲁特:伊本·赫勒敦出版社 1974 年版。

③ [约旦]苏莱曼·穆萨:《约旦的社会变化(1945~1970)》(阿拉伯文),安曼:新约旦研究中心 2003 年版。

④ [约旦]纳伊姆·易卜拉欣·扎西尔:《约旦当代社会事务》(阿拉伯文),安曼:阿拉伯研究出版社 2010 年版。

⑤ [约旦]穆罕默德·阿卜杜·凯里姆·胡拉尼:《社会资本部落:对约旦社会部落忠诚的构成及其转变的社会学研究》(阿拉伯文),载《约旦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卷,第 2 期。

⑥ [埃及]阿卜杜·法蒂勒:《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结构及阶级构成》(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 1997 年第 2 版。

⑦ [埃及]艾哈迈德·穆萨·巴达维:《阿拉伯国家中产阶级的变化》(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 2013 年版。

眼于某个问题进行探索分析,典型的有理查德(Richard F. Nyrop)的《约旦国家研究》^①一书。国内并没有专门涉及约旦社会结构的专著,《列国志·约旦》^②一书中仅就约旦政府工作人员等级作了介绍。李茜的博士论文《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③中有部分涉及社会结构的内容。综合来看,关于约旦社会结构的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阿拉伯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对约旦社会结构的变化普遍不够重视。关于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补充与更新。

一、联盟框架下社会上层结构的稳定传承

在历史上,约旦曾经并不代表一方国土,而只是一条走廊。^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为瓜分双方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共同达成《赛克斯—皮科协定》,从地中海沿岸到波斯边境山区画了一条线,该线以北归法国控制,以南由英国统治。在新确定的中东版图中,英国管理外约旦和伊拉克地区,法国控制黎巴嫩和叙利亚,两国共管巴勒斯坦。1921年,英国支持阿卜杜拉一世(*Abd Allāh Al-Awal*)在外约旦地区建立酋长国,并对其实行委任统治。在这一新国家的框架下,在共同文化和传统习俗的基础上,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约旦社会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在约旦社会形成的过程中,社会群体与社会成员因对社会资源占有数量的差别而产生层化现象。王室、家族与部落依靠彼此间建立的联盟关系,优先掌握了社会权力资源,并在家族与部落内部实现了上层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稳定传承。

(一) 约旦王室与部落联盟

英国利用约旦的地缘优势以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对英国而言,维护外约旦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是其进行委任统治的首要任务。1921年,英国军官弗雷德里克·皮克(Frederick G. Peake)受驻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当局委托组建阿拉伯预备军;1923年,外约旦警察与预备军合并为阿拉伯军

^① Richard F. Nyrop, *Jordan: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oreign Area Studies, 1980.

^② 唐志超:《列国志·约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③ 李茜:《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西北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论文,2016年6月。

^④ Arthur R. Day, *East Bank/West Bank: Jordan and the Prospects for Peace*, New York: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 1986, p. 10.

团;1926年,英国组建外约旦边防军。^① 尽管如此,约旦地区仍不稳定,部落叛乱与家族^②冲突时有发生。1921年,库拉地区(*Al-Kourah*)爆发以谢赫库莱卜·舒莱达(*Sheikh Kulaib al-Shurayda*)为首的“库拉叛乱”;1923年,拜勒加省(*Al-Balqa'*)爆发以谢赫马吉德·阿德万(*Sheikh Majid Al-Adwan*)为首的“阿德万革命”;1926年,穆萨谷地(*Wadi Musa*)爆发大规模的部落与家族冲突。约旦本地部落与家族更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与地理形势,阿拉伯军团和外约旦边防军在维护约旦稳定与安全方面力不从心。

为实现对外约旦的稳定统治,英国驻外约旦司令格鲁布(*John Bagot Glubb*)主张采取联合部落的方针,旨在说服部落势力加入维护约旦王室队伍。当时,外约旦地区的主要部落有胡威塔特部落(*Al-Howeitat*)、哈桑部落(*Bani Hassan*)、阿德万部落(*Al-Adwan*)和萨赫尔部落(*Beni Sakhr*)等。在英国的游说下,约旦哈希姆王室与主要部落之间缔结了社会与政治契约。阿卜杜拉一世将土地分配给部落首领,使其成为拥有固定资产的大地主与特大地主,并给予其行政头衔。作为回报,部落首领宣布效忠王室。

这一时期,部落首领的行政职务仅是名义上的,他们的实际权力仍集中体现在以部落经济和军事为基础的部落权力上。英国实行委任统治时指导外约旦建立和完善军事、法律与行政机构,但却没有制定促进约旦经济全面发展的政策,英国的政策只是为了维持约旦社会的稳定。1938年,格拉布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上指出,外约旦的安全问题是其繁荣发展的基础,外国资本的进入会削弱现有律法和秩序在维护稳定方面的作用。^③ 在此背景下,英国竭力维持约旦现代国家体系与传统社会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维护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定以保障王国的安全。因此,在建立稳定联盟的基础上,英国极力维持约旦社会经济结构的传统状态,约旦王室、部落领导层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基本保持不变。

(二) 上层地位的稳定传承

1946年外约旦独立后的十年间,约旦王室虽仍在财政上依赖英国,但王室与

^① 唐志超:《列国志·约旦》,第49页。

^② 从语义和文化意义上看,部落包含家族。但约旦属于人为划定的疆域,约旦境内存在的部落并不完整,有些部落只是其中的某个家族归于约旦。

^③ [约旦]穆斯塔法·哈马尔纳:《英国在约旦实行委任统治时期的经济政策(1932-1946)》(阿拉伯文),载[约旦]穆斯塔法·哈麦兰主编:《约旦经济:问题与前景》(阿拉伯文),安曼:战略研究中心1993年版,第12-13页。

部落的联盟已成为维持王室统治的关键。1948年阿以战争期间,约旦部落的军事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约旦一举控制了约旦河西岸的大部分地区。1956年约旦实现完全独立,哈希姆家族成为世袭的王室家族。王室家族与部落的联盟依旧,部落力量仍是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1968年3月,以色列兵分三路跨过约旦河,约旦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尤其是来自和王室结盟的部落与家族的人表现最为突出。他们一直信守盟约,捍卫哈希姆家族的统治。^①

约旦独立至今,社会上层经济基础的稳定保障了社会结构的基本稳定。整体而言,约旦现代化改革较为保守,实行循序渐进的方针,不借助土地改革、国有化等激进手段,王室始终与部落酋长、宗教阶层等保守力量保持较为和谐的关系。^②以土地占有情况为例,约旦境内大地主与特大地主的人数一直较为稳定。1950年约旦占地2,000杜诺亩^③以上的大地主有117人^④;1975年约旦大地主人数有103人^⑤;2007年大地主人数有109人^⑥;2017年大地主人数为102人^⑦。

在王室与部落联盟的框架内,社会结构中的传统部落上层势力逐步向现代国家体系渗透,部落领导层人员的身份逐渐向国家高级公职人员转变,社会上层结构继续保持基本稳定。在约旦现代化进程中,侯赛因国王(*Al-'usayn Ibn Talal*)逐步完善了约旦民族国家构建,使部落领导层的合法权利越来越依赖于中央政府权力,进而使部落民众对部落领导层的权威认同更多地来源于中央政府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力。^⑧随着约旦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原有部落经济衰退,部落领导必须抢占政治权力以在新经济形式中赢得先机,并将这种政治权力在部落的大家族内部传递以维护其长久利益。

① [约旦]艾哈迈德·艾布·沙纳尔:《阿尔提哈部落:文化与历史》(阿拉伯文),安曼:穆阿塔兹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5页。

② 黄民兴:《试析中东现代化的特点》,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29页。

③ 面积单位,1杜诺亩约等于939.3平方米,折合1.4亩。

④ 《年度报告(1950年)》(阿拉伯文),约旦国家统计局,1950年,第77页。

⑤ [约旦]哈姆德·卡塞斯贝:《约旦的粮食安全与经济政策》(阿拉伯文),安曼:约旦中央银行1984年版,第19页。

⑥ 《2007年农业普查》(阿拉伯文),约旦国家统计局,2017年8月,第41页,<http://dosweb.dos.gov.jo/wp-content/uploads/2017/08/Agr1.pdf>,登录时间:2019年5月6日。

⑦ 《2017年农业普查》(阿拉伯文),约旦国家统计局,2017年8月,第10页,http://dosweb.dos.gov.jo/wp-content/uploads/2018/08/Agri_Result_census_2017.pdf,登录时间:2019年5月6日。

⑧ Uzi Rabi, *Tribes and States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5.

部落与大家族的上层地位能够得到稳定的代际传承。部落领导层子弟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和政治资源,并借助其出身及门第跻身于政府各部门担任要职。法耶兹家族(Al-Fayez)是萨赫尔部落的主要家族之一,密斯高勒·法耶兹(Mithqal Al-Fayez)是该部落的重要首领之一,他与阿卜杜拉国王建立了联盟关系;其子阿基夫·法耶兹(Akif Al-Fayez)由王国部落协议主管成长为约旦资深政治家,多次担任内阁大臣职务,与侯赛因国王关系密切;阿基夫·法耶兹之子费萨尔·法耶兹(Faisal Al-Fayez)也多次担任政府要职,并于 2003 年至 2005 年担任约旦首相一职。法耶兹家族三代人与哈希姆王国三代国王均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其政治经济利益与哈希姆王室命运结为一体。自约旦独立以来,有十多位内阁大臣均来自哈桑部落,哈威塔特部落在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员的人数则更多。在约旦现代政治体系发展进程中,王室与部落联盟之外的一些有名望的大家族同样在代际传承中一直占有相对稳定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如马贾利家族(Al-Majali)、里法伊家族(Al-Rifai)。

(三) 上层地位传承的现代政治工具——政党和议会

政党是现代约旦国家体系中部落与大家族政治权力合法传承的工具。阿卜杜拉国王要求部落联盟的领导成立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以支撑王室统治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成立的政党有马吉德·阿德万的约旦人民党(*Hizb Al-Sha'ab Al-Urduni*)和密斯高勒·法耶兹的约旦团结党(*Hizb Al-Tadamon Al-Urduni*)等。^①侯赛因统治前期,萨米尔·里法伊(Samir Al-Rifai)领导的祖国党(*Hizb Al-Umma*)和法莱哈·马达哈(Falah Al-Madadha)领导的国家联合党(*Hizb Al-Ittihad Al-Watani*)是约旦王室统治的忠诚支持者。部落与大家族领导的政党在国王授意下参加议会选举。在 1951 年至 1958 年的议会选举中,126 名议员中有 86 名来自声势显赫的大家族。^②

议会是约旦现代化进程中部落与家族另一个有效实现地位传承的政治工具。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大背景下,新兴政党增多,政府因此感到统治受到威胁。自 1957 年起,约旦实行了为期 30 多年的党禁政策。1967 年至 1989 年,约旦国民议会众议院从未进行过普选,其只在 1984 年举行过一次补选。在此期间,部落与大家族借助其号召力以及与王室的密切关系,通过把持议会攫取政治权力,

^① [美]玛丽·威尔逊:《英国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阿卜杜拉与外约旦》(阿拉伯文),[黎巴嫩]法德勒·吉拉哈译,贝鲁特:高德慕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7 页。

^② Ishaq Y. Qutub,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Jordan," *Sociological Bulletin*, Vol. 19, No. 2, 1970, p. 118.

维护其既得利益与地位。由此,议会成为部落与大家族控制政权、传承地位的有力工具。在1989年至1998年的三次议会选举中,虽然议会成员名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家族声望与社会地位是成为国会议员的首要影响因素。^①因此,即使在党禁政策结束后,部落与大家族成员仍能跻身于议会之列,活跃在约旦上层社会。以里法伊家族为例,萨米尔·里法伊曾分别于1951年、1955年和1958年三次担任首相并兼任内政大臣;他的儿子扎伊德·里法伊(*Zaid al-Rifai*)曾分别于1973年和1985年两次组建政府,并于1997年至2009年担任参议院院长;他的孙子萨米尔·扎伊德·里法伊(*Samir Zaid al-Rifai*)曾先后担任内政大臣,并于2009年至2011年担任首相。

阿卜杜拉二世上台后,虽多次对议会选举加以改革,但始终未改变部落与大家族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局面。纵然经历了中东变局的冲击,在2013年的议会选举中,37个家族仍赢得议会约60%的席位;其中,16个家族赢得了70个席位,仅哈桑部落就占据了13个席位。^②2016年,约旦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但仅有6.4%的候选人来自党派联盟,却有43.5%的候选人来自部落联盟势力。^③

综上所述,部落与家族通过政党与议会等现代政治工具实现了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承,维持了社会上层结构的相对稳定。

二、约旦中产阶层的发展与代际传递

约旦的现代化进程由国家主导,未经历自下而上民间力量的推动。国家与社会层面都没有发生深层的政治变革或激烈的阶级革命。在此基础上,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部落成员的原有地位得到延续,并发展成为约旦现代中产阶层。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海湾经济的带动,约旦中产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

(一) 传统部落成员向中产阶层转变

约旦传统社会以部落为基本组织形式。传统部落民可分为贝都因人(游牧民)、农村人和城市人,其中,贝都因人占绝大多数。农业资源贫乏的特殊地理环

^① [约旦]尼扎姆·迈哈穆德·巴拉卡、[约旦]麦欣·哈利勒·阿拉叶白:《约旦的议会选举》(阿拉伯文),伊尔比德:约旦研究中心2000年版,第20、129页。

^② [约旦]穆罕默德·达曼:《约旦:家族民主》(阿拉伯文),中东网,2013年3月20日, <http://alturl.com/rdjzr>, 登录时间:2018年10月19日。

^③ 《联合监督小组:来自政党的候选人有6%》(阿拉伯文),萨比勒网,2016年9月3日, <http://alturl.com/dfjjc>, 登录时间:2019年5月6日。

境造就了阿拉伯人重商抑农的文化传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较少且地位较低。约旦传统社会结构呈现明显的上下分层,即极少数的上层统治精英和绝大多数的下层被统治者。^① 约旦社会中原有的中产者规模小、人数少,主要由乡村中的中富农、城镇中的手工业者以及城乡行政体系中的管理人员组成。

约旦建国初期,为实现国家的稳定,政府推行游牧部落民定居计划。约旦政府在部落聚集区建造供水设施,为游牧部落成员分配相邻土地;派出农业专家指导耕种,免费提供种子;在水源区为游牧民修建房屋,以小型村庄吸引牧民定居。^② 一方面,在王室与部落联盟的基础上,政府分给部落领导人大量土地;部落领导人将土地在部落与家族内部进行分配。另一方面,政府鼓励小部落的游牧民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如阿加尔买部落和阿巴达部落。由此,约旦社会出现一批新的富农。

富农是约旦社会结构中较为稳定的中产阶层。约旦学者对富农的划分标准存在差异,如萨义德·贾瓦德(Said Jawad)将占地在 200 杜诺亩至 1,000 杜诺亩的人界定为富农;^③哈尼·胡拉尼(Hani Hourani)将占地在 300 杜诺亩至 2,000 杜诺亩之间的人界定为富农。^④ 划分标准各异导致统计数据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富农在约旦农村的社会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1950 年,拥有 200 杜诺亩至 2,000 杜诺亩的土地所有者为 5,556 人,其所占耕地比例为 38.7%。^⑤

为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约旦政府在农村建立了合作社,向合作社提供农用机械与生产工具。这些合作社基本掌握在富农手中,他们充分利用合作社的机械设备经营现代化农业生产,依托先进的管理方式与政府的贷款支持,经营现代化的家禽养殖场,从而成为约旦社会结构中稳定且延续性较强的中产阶层。

随着国家发展政策的引导,约旦社会的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约旦社会逐渐从部落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传统部落民向现代公民身份转变,约旦的社会结构亦随之发生变化。部落及大家族的领导层过渡成为相对稳定的社会上层统治精英;传统部落民成为约旦现代社会的中下层公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也有一些不从事农业劳动的部落民依靠与领导层的亲缘与血缘关系进入政府机关、国家安全与管理部門工作。^⑥ 与此同时,约旦现代国

① Ishaq Y. Qutub,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Jordan," p. 116.

② 李茜:《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第 93 页。

③ [约旦]萨义德·贾瓦德:《约旦农村的社会冲突》,第 25 页。

④ [约旦]哈尼·胡拉尼:《外约旦的社会经济结构》,第 152 页。

⑤ 《年度报告(1950 年)》,第 75-76 页。

⑥ [约旦]萨义德·贾瓦德:《约旦农村的社会冲突》,第 18 页。

家行政体系与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为部落民一跃成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机遇。

在部落民身份与地位的转变过程中,部落地位与家族名望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部落民身份的转变与其在部落内部的等级密切相关,部落内亲缘与血缘关系构成影响部落民身份起点的主要因素。时至今日,家族和部落势力仍然作为较为稳定且有力的因素影响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政治、经济地位。整个阿拉伯社会,尤其是马什里克(*Al-Mashraq*,即“阿拉伯东方”)地区保留有较浓重的传统部落情感;除了悠久的阿拉伯文化传统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该地区社会中产阶级产生的基础不是由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关系,而是根深蒂固的血缘与宗亲关系。^①

(二) 中产阶层的发展

中产阶级是社会结构中的稳定力量,其力量壮大为约旦社会的稳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政府逐步建立和完善行政体系,促进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实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政府的现代化政策为部落民及其子女提供了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机遇,提高了中产阶层的素质与能力。同时,海湾石油经济的发展为约旦中产阶级提供了获得高薪的机会。国内外发展机遇使得约旦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约旦自上而下行政体系与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为中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游牧民向中产阶级的转变夯实了内部条件。1952年1月1日,约旦政府开始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政策,并取消了中学生的学费。1962年,约旦建立国内第一所大学——约旦大学;2003/2004学年,约旦共有21所公立大学,在校大学生人数达到157,766人。^② 2017/2018学年,约旦公立大学本科在校生人数达134,779人,私立大学在校生人数达67,222人。^③

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而海湾石油经济的发展为约旦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约旦赴海湾工作人员受教育水平较高,大多从事中产职业。以1985年为例,约旦外出务工人员中有约33%的人拥有大学文凭,约32%的人拥有高中文凭,80%的人从事社会服务、公共管理和商业贸易工作。^④ 截至2018年,约旦在海湾国家的侨民中83.8%的人拥有本

^① [黎巴嫩]艾哈迈德·巴阿勒百克:《东阿拉伯社会中产阶级的概念和身份变动》(阿拉伯文),载《阿拉伯未来》2012年第403期,第88页。

^② 唐志超:《列国志·约旦》,第223页。

^③ [约旦]塔伊赛尔·纳伊玛:《公立大学学生的增长率下降》(阿拉伯文),明日网,2017年12月31日,<http://alturl.com/u8wjv>,登录时间:2019年12月19日。

^④ 《年度报告(1985年)》(阿拉伯文),约旦就业与社会发展部,1985年,第22页。

科及以上学历,平均年收入为 73,438 第纳尔。^①

约旦现代化进程虽屡次受地区安全局势的冲击,但国内形势总体保持稳定。随着约旦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产阶级的经济收入不断增长,队伍持续壮大。约旦社会经济委员会依据家庭收入、支出以及所占社会财富与资源情况,发布了题为《2008 年中产阶级评估》的政策报告。报告显示,约旦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 41.1%,其中 67%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40%的家庭拥有私家车,46.6%的人享有社会保障,86%的人有医疗保险。^②

(三) 中产阶级的代际传递

传统部落成员完成向现代公民身份的转变后,化身为中产阶级的部落民及其子女十分重视其中产地位的代际传递,并将教育作为完成代际传递的重要支柱之一。约旦中产阶级曾是家族血缘关系的受益者,却深知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对个人的社会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很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以 2008 年为例,中产阶级家庭基本饮食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 40%以上,而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 7.75%^③,高于当时全国 5.1%的平均水平^④。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年度教育支出为 630.3 第纳尔,而富裕的中产阶级则超过 1,106.7 第纳尔。^⑤由此可见,为实现其子女中产阶级身份地位的延续,中产阶级对教育的投资相当可观。

中产阶级极力维持其地位及代际传递,但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如私立学校费用提高、大学生就业困难、结婚成本上升等。私立学校的学费以每年 10%~30%的速度增长,导致不断有学生从私立学校转入公立学校。^⑥ 2013 年,约 3 万名学生从私立学校转入公立学校,与此同时,只有约 1 万名学生从公立学校转入

① 《阿拉伯海湾国家约旦侨民的调查结果》(阿拉伯文),约旦战略论坛,2018 年 7 月,第 11 页, http://www.jsf.org/sites/default/files/AR%20Jordanian%20Expatriates%20in%20the%20Gulf%20-%20FINAL%203.7.2018_0.pdf, 登录时间:2019 年 12 月 19 日。

② “Assessing the Middle Class in Jordan (2008),”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p. 1, [http://www.mop.gov.jo/echobusv3.0/SystemAssets/pdf/Reports/Assessing_the_Middle_Class_in_Jordan_\(2008\).pdf](http://www.mop.gov.jo/echobusv3.0/SystemAssets/pdf/Reports/Assessing_the_Middle_Class_in_Jordan_(2008).pdf), 登录时间:2019 年 5 月 8 日。

③ Ibid., p. 21.

④ 《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阿拉伯文),约旦国家统计局 2008 年版,第 137 页。

⑤ “Assessing the Middle Class in Jordan (2008),” p. 21.

⑥ 《约旦教育的挑战》(阿拉伯文),半岛网,2012 年 10 月 1 日, <http://alturl.com/aqmpk>, 登录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私立学校。^① 大学毕业生失业率方面,以 2012 年和 2013 年为例,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失业人员占拥有同等学力总人数的 15.9% 和 17.8%。^② 在结婚成本方面,2014 年约旦男方家庭结婚的平均花费在 1.5 万至 2.5 万美元不等,还不包括房子和家具、家电支出。^③

中产阶级代际传递困难由多方面原因造成,首先是因为约旦国内工业基础薄弱,抵抗外部经济动荡冲击的能力弱;其次,政府缺乏保护与培养中产阶级发展的有效政策;最后,约旦目前的教育体系无法在中产阶级代际延续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就是青年失业率较高。中产阶级代际传递困难构成社会中层向下层流动的压力,并对约旦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三、巴勒斯坦难民向约旦国民的转变及其身份落差

在约旦现代化进程中,大部落、大家族与王室联盟攫取了上层社会资源,部落成员依靠亲缘与血缘关系获取了现代中产阶级的地位。然而,由于巴勒斯坦难民的大量涌入,约旦社会结构的变化显得更为复杂。1948 年和 1967 年两场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难民涌入约旦,导致约旦人口结构的变化,随之引发了约旦社会关系的变化。伴随约巴关系经历合作、冲突、修复和正常化的不同阶段,约旦政府对其境内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政策也有所不同。在此过程中,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难民到公民的身份转变,并出现身份落差。

(一) 约旦政府的巴勒斯坦难民政策

1950 年,阿卜杜拉国王宣布约旦河东岸与西岸合并,合并后的 20 年间,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政治领域拥有一定的地位,但他们基本上都担任文职。国防部与军队一直掌握在约旦人手中。约旦河东岸与西岸合并之后,约旦政府高级职位中不乏巴勒斯坦人的身影。以大地主和大人物为首的巴勒斯坦人占约旦议会上下两院 50% 的席位。^④ 侯赛因·哈利迪(Hussein Al-Khalidi)、艾哈迈德·图甘(Ahmed Toukan)和卡塞姆·里马维(Qasim Rimawi)等政治家都是巴勒斯坦裔。

^① [约旦]阿米沙·尤素福:《约旦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一瞥》(阿拉伯文),意见网, <http://m.alrai.com/article/640029.html>, 登录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② 《约旦就业统计(2009~2013)》,约旦国家统计局,2014 年 11 月,第 24 页。

^③ [约旦]艾斯阿德·阿祖尼:《约旦:婚礼的巨额花费》(阿拉伯文),旗帜网,2014 年 8 月 11 日, <http://alturl.com/4bagc>, 登录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④ [黎巴嫩]贾比尔·苏莱曼:《约旦的巴勒斯坦人:文件、材料与数据》(阿拉伯文),载《巴勒斯坦研究》1990 年第 6 卷,第 24 期,第 151 页。

侯赛因·哈利迪曾担任耶路撒冷市长,后成为约旦参议院议员,并于 1957 年 4 月担任约旦首相。艾哈迈德·图甘在 1950 年至 1972 年间先后担任约旦文化大臣、外交大臣、国防大臣、副首相等职位,并于 1970 年 9 月担任首相。卡塞姆·里马维曾于 1962 年至 1980 年间两次担任政府大臣,1980 年 7 月曾担任约旦首相。

1970 年“黑九月”事件发生后,约旦开始对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采取“区别对待政策”。此后 20 年间,约旦政府不断收紧巴勒斯坦人申请国籍政策。巴勒斯坦人在约旦的政治地位逐渐下降,在政府单位工作的人员日益减少。^①此外,所有 1948 年之后进入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多是出于政治避难,在政治权利方面,他们受到国籍、收入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1988 年,侯赛因国王宣布约旦脱离与约旦河西岸的法律与行政关系。此后,巴勒斯坦人在约旦的参政人员更少,政治生活空间受到挤压。

1988 年至今,约旦政府中巴勒斯坦裔的比例与人数一直受限。为安抚巴勒斯坦人的情绪,约旦政府倾向于任命对约旦国家认同较高的巴勒斯坦后裔担任行政职位。1989 年至 2010 年间,约旦籍巴勒斯坦议员所获得的席位仅占议会上、下两院总席位的 15%至 20%。^②2011 年 10 月和 2012 年 4 月的内阁成员中巴勒斯坦裔均占 6 人。^③到 2012 年 10 月,阿卜杜拉·纳索尔(Abdullah Al-Nsour)内阁成员中仅有 3 名巴勒斯坦裔约旦人。2016 年,巴勒斯坦裔在政府和议会中的比例均有所改善:内阁成员中巴勒斯坦裔增至 7 人,在议会中占比由上届的 15%增至 25%,获得 32 个席位。^④他们多担任环境、旅游等文职职务,且绝大多数在约旦出生、成长,对约旦的国家认同感较强。

(二) 巴勒斯坦难民向约旦国民的转变

多次阿以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巴勒斯坦难民,而约旦是接收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国家。从 1948 年至 1961 年,受战争、经济等因素影响,约旦河东岸的巴勒斯坦人有 38 万之多;1967 年“六五战争”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掀起新一轮移

^① [约旦]阿里布·兰塔维:《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及“公民”与“国家”问题》(阿拉伯文),巴勒斯坦网,<http://palestine.assafir.com/Article.aspx?ArticleID=1855>,登录时间:2018 年 10 月 26 日。

^② 同上。

^③ [约旦]阿梅尔·哈南德:《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统治期间的政府和官员是如何组建的?》(阿拉伯文),城市网,2012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almadenahnews.com/article/128305>,登录时间:2019 年 12 月 19 日。

^④ [约旦]苏莱曼·哈拉利斯:《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大幅增加》(阿拉伯文),贾夫拉网,2016 年 9 月 22 日,<http://www.jfranews.com.jo/more-155311-20>,登录时间:2019 年 12 月 19 日。

民潮,1970年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增至90万人,1982年增至110万人。^①目前,约旦官方数据显示,约旦行政区内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共计2,275,589人,占近东救济工程处登记巴勒斯坦难民总人数的39.1%;约旦十大巴勒斯坦难民营共有396,006人,仅占境内登记难民人数的17.4%,其余82.6%分布在另外三处难民营(哈桑难民营、马达巴难民营和索赫纳难民营)及约旦各主要城市。^②难民营外的巴勒斯坦难民主要集中在安曼、伊尔比德、扎尔卡这三大城市。

巴勒斯坦人从难民向国民的转变过程,伴随着约旦现代化发展的整个进程。约旦的发展政策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就业与生存机会,他们在城市中从事社会服务、商业贸易、行政管理等行业,逐渐融入约旦社会,以实际行动推动了约旦城市化的发展,成为约旦社会结构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巴勒斯坦难民从整体上改变了约旦的社会结构,尤其是扩充了中下阶层。以中产阶级为例,涌入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不乏医生、工程师、药剂师、律师、教师及手工业者。^③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并非都拥有约旦国籍,可分为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裔约旦人。1950年合并约旦河西岸后,阿卜杜拉宣布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拥有约旦国籍的约旦公民。1954年颁布的约旦《国籍法》规定,凡是在约旦连续居住满15年的居民均可申请约旦国籍,但同时要求申请人必须放弃原国籍。由于巴勒斯坦人回归故土的愿望依然强烈,起初居住期满后主动申请约旦国籍的人并不多。当巴勒斯坦人深感回归故土无望,为获得国民待遇而提出申请约旦国籍时又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1973年以后进入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大多只持有约旦护照,但无约旦国籍。^④

巴勒斯坦裔约旦人的具体人数和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占约旦总人口的70%,也有学者认为只占10%,官方数据为42%。^⑤从入境时间上看,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1948年前迁入约旦境内者,他们较早地融入约旦社会,拥有同约旦公民一样的

① [黎巴嫩]贾比尔·苏莱曼:《约旦的巴勒斯坦人:文件、材料与数据》(阿拉伯文),第140-141页。

② 《约旦对难民问题的态度》(阿拉伯文),约旦政府巴勒斯坦事务处官网, <http://www.dpa.gov.jo/page.php?60-60>, 登录时间:2018年10月26日。

③ [约旦]阿里·穆哈法兹:《约旦现代史:政党与精英》(阿拉伯文),安曼:新约旦研究中心2010年版,第48页。

④ 依据2015年7月笔者在约旦访学期间对当地约旦巴勒斯坦人的访谈。

⑤ [约旦]穆罕默德·纳吉尔:《关于约旦巴勒斯坦人数的争议》(阿拉伯文),半岛网,2009年7月20日, <http://alturl.com/aipk7>, 登录时间:2018年10月26日。

权利和义务;第二类是 1948 年后迁入约旦境内者,他们依据迁入之前自身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居住在城市或难民营;第三类是 1967 年后从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迁入约旦境内者,在法律上,他们属于流离失所的约旦人。^① 其中,第一类与第二类巴勒斯坦难民大多已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UNRWA) 登记入册。

在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第一类巴勒斯坦人与约旦部落成员类似,在家族势力与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作用下,或跻身于社会上层,或转变为社会中下层,竭力实现阶层的传承与上升。第二类和第三类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权利与社会地位,则与约旦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

(三) 巴勒斯坦难民的身份落差问题

巴勒斯坦难民在向约旦国民的身份转变过程中政治权利受限,社会地位明显出现落差。约旦主流政党并不主张巴勒斯坦人参政,也不主动吸纳他们。约旦著名社会学家哈尼·胡拉尼指出,在实践层面,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权利确实受到一定阻碍,一些政党与其他势力垄断选举且不鼓励巴勒斯坦人参与政治。^②

获得约旦国籍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受经济条件的限制长期未获得选举权。国民选举权仅局限于拥有资本或纳税者。约旦市政选举法规定,个人必须通过缴纳土地税或市政税获得选举权,须连续缴纳 12 个月且平均每月缴税额不少于 1 第纳尔;如财产所有权属于多人,则每人均须单独缴纳个人份额。^③ 由此,许多背井离乡的约旦籍巴勒斯坦人因财产问题被剥夺选举权。随着约旦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约旦政府于 1986 年修订了与纳税金额挂钩的选举法。至此,拥有约旦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才真正获得这一政治权利。

巴勒斯坦难民在融入约旦社会过程中,其社会地位出现落差已成事实。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逐渐由宽松至收紧,引起巴勒斯坦人对沦落为约旦二等公民的担忧。约旦多次表示境内已有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不愿接受他国的巴勒斯坦难民,为此,约旦多次关闭与伊拉克的边境。^④ 近年来,约旦跟踪与调查局开

^① [黎巴嫩]贾比尔·苏莱曼:《约旦的巴勒斯坦人:文件、材料与数据》(阿拉伯文),第 140 页。

^② 《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阿拉伯文),半岛网,2005 年 8 月 16 日, <http://alturl.com/gnvi6>, 登录时间:2018 年 10 月 27 日。

^③ [黎巴嫩]贾比尔·苏莱曼:《约旦的巴勒斯坦人:文件、材料与数据》(阿拉伯文),第 151-152 页。

^④ 陈天社:《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影响》,载《世界民族》2009 年第 3 期,第 80 页。

始撤销非法获得国籍的行动,此举引发巴勒斯坦人的广泛关注。2004年至2008年间,有2,7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取消约旦国籍。对此,约旦政府官方发言人纳比勒·谢里夫(Nabil Al-Sharif)解释说,这是为了贯彻1988年与约旦河西岸脱离的系列决议,确保巴勒斯坦人留在他们的领土上,粉碎以色列驱赶巴勒斯坦人离开国土的阴谋。^①

2013年10月,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塔希尔·马斯里(Taher Al-Masry)在参议院选举完成后被免除参议院院长一职,此事被指责为对巴勒斯坦人及巴勒斯坦裔约旦人的歧视。^②2014年12月,约旦众议院副院长哈利勒·阿提亚(Khalil Attia)表示,要对巴勒斯坦裔高级官员保持警惕,建议跟踪与调查局扩大工作范围,更直言不要让巴勒斯坦裔约旦人担任政府高级领导职务。^③类似事件触动了巴勒斯坦裔约旦人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引起其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担忧,并引发约旦境内大批没有获得约旦国籍的巴勒斯坦难民的骚动与抗议。2019年11月,约旦首相奥马尔·拉扎兹(Omar Al-Razzaz)重新组阁。截至目前,官方介绍和新闻媒体尚无提及内阁成员中巴勒斯坦裔的信息。无论是新内阁中确实不存在巴勒斯坦裔成员,还是官方有意回避或淡化这一身份标签,都无法掩盖巴勒斯坦难民融入约旦社会中的身份落差问题。此外,巴勒斯坦人融入约旦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使约旦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难民身份的转变对整个约旦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的挑战,是约旦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难题。

四、约旦社会内部的阶层流动与结构变化

在现代社会,造成阶层分化的社会资源构成不仅仅是土地、资本、政治权力等传统因素,市场、科学技术、人的管理能力、知识等无形资源也作用于社会阶层分化,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不同阶层地位的人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由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约旦社会结构与分层趋向多元化。原有社会阶层中的平民与部落普通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向上流动;

① [约旦]穆罕默德·纳加尔:《约旦取消数千巴勒斯坦人的国籍》(阿拉伯文),半岛网,2010年2月1日,<http://alturl.com/h9txr>,登录时间:2018年10月28日。

② [约旦]萨米·穆哈赛纳:《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对罢免米斯里参议院院长一职感到愤怒》(阿拉伯文),东方网,<http://www.alsharq.net.sa/2013/10/27/980793>,登录时间:2018年10月28日。

③ 《哈利勒·阿提亚:我们不要巴勒斯坦裔大臣》(阿拉伯文),约旦网,2014年12月4日,<http://www.jordanzad.com/index.php?page=article&id=182066>,登录时间:2018年10月28日。

与此同时,原来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压力下也出现向下流动的现象。

(一) 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约旦传统部落社会内部等级严明,部落框架内等级划分的基础是亲缘与血缘关系,部落等级向上流动渠道闭塞。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部落生产方式在政府的引导下发生改变,现代社会阶层逐渐取代传统部落等级。虽然部落与家族领导层在现代化过程中攫取了社会上层的政治权力,传统部落民借助血缘与宗亲关系优先占据了中间阶层的生产资料与现代职业,但现代阶层划分的基础已悄然发生改变。在约旦现代化进程中,影响社会阶层的因素主要有军队建设、农业与工业现代化生产、市场与商品贸易、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等。这些因素为约旦社会阶层的流动开辟了渠道。

第一,参军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约旦的现代化源起于军事,社会阶层的流动最先出现在军队。1916 年阿拉伯大起义号召了许多底层农民和游牧民参军。由此,他们获得了稳定的工资收入和正式职业,有些人还晋升为军官,这激发了更多的底层民众通过参军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① 二战期间,英国面对军事上的巨大压力招募了不少军官和大批士兵。1928 年至 1945 年间,约旦军队人数增长了 5 倍之多,^②底层民众通过参军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

第二,手工业工商者等小资产阶级出现。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与对外贸易的发展,约旦的小商品贸易培养了一批新阶层。1950/1951 财年,约旦全国有营业执照的小商品贸易与手工制作企业共计 5,569 家,其中 1,391 家属于零售商,277 家属于批发商,2,297 家属于杂货商,1,317 家属于手工业者。^③ 这些小商人与手工业者多是来自农村与城市边缘的社会下层人员,他们与部落、大家族上层的关系较疏远,没能从传统关系中获得土地或职位。大进口商和批发商攫取大部分利益,他们只从商品销售中赚取小部分的利益。尽管如此,他们仍属于社会中间阶层的小资产阶级。

第三,赴海湾国家智力输出者成为小资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20 世纪 70 年代,海湾石油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也需要从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力。约旦低教育水平与低技术工种的社会下层人员依靠出卖苦力劳动赚取丰厚报酬,这使得约旦侨汇收入大幅增加,下层家庭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他们回国后,往往会在本地进行投资,于是从海外雇佣工人转变为国内

① 李茜:《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第 149 页。

② [约旦]哈尼·胡拉尼:《外约旦的社会经济结构》(阿拉伯文),第 177 页。

③ 《年度报告(1950 年)》,第 159 页。

个体私营业主,成为小资产阶级。^①同时,海湾国家中有大量的约旦籍工程师、教师、医生等高级技术与专业人才。^②这些人或出国前已经是中产阶级,或回国后凭借其高收入成为新中产阶级,是伴随经济能力提高实现向上流动的阶层。

第四,在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军队的建立与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打开了社会下层与社会中层之间的流动渠道,现代教育与民主进程的推进巩固了社会中层的地位,并疏通了社会中层向社会上层的流动渠道。教育在实现社会流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高等教育。约旦优秀的中产阶级子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非借助家族势力,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流动,甚至以参议院议员身份跻身于社会上层,如法齐·穆奇(Fawzi Al-Mulqi)、哈利勒·萨利姆(Khalil Al-Salem)、哈马德·法尔汉(Hamad Al-Farhan)等。^③然而,约旦民众通过议会途径实现民主扩展的成效不大,中产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有限,大家族与部落势力在参议院中占据几乎一半的席位。约旦政权的延续与部落、大家族的利益息息相关,约旦政府一般选择通过压制反对派,削弱反对势力,优先满足部落与家族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政权的支持。^④

(二) 中产阶级向下流动的压力及影响

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约旦经济整体依赖外援、侨汇与旅游。居民收入受到国际环境、周边邻国局势及国际油价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中产阶级。因此,约旦中产阶级地位比较脆弱,容易出现向下流动现象。

第一,通货膨胀引发社会阶层向下流动。依靠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约旦社会下层人员可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但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与国内经济压力的增加,导致社会阶层出现向下流动。进入21世纪以来,受全球经济危机与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约旦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中产阶级出现向下流动趋势。自2005年起,约旦出现了高通货膨胀。2013年约旦国内生产总

^① [埃及]萨阿德丁·易卜拉欣、[埃及]阿卜杜·法蒂勒:《阿拉伯劳动力的流动》(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1991年版,第197-198页。

^② 蔺昭仁:《蓬勃发展的约旦高等教育事业》,载《中国高等教育》1986年第2期,第47页。

^③ [约旦]苏莱曼·穆萨:《约旦的社会变化(1945~1970)》(阿拉伯文),安曼:新约旦研究中心2003年版,第341-351页。

^④ Taher Kanaan and Joseph Massad, "Jordan: Propellers of Autocracy," in Ibrahim Elbadawi and Samir Maskdisi, eds., *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 Explaining the Defici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112.

值增长了 2.8%，但通货膨胀率达 5.6%。^①

第二，约旦中产阶级处于萎缩状态。2010 年，由约旦国家统计局、计划与国际合作部共同合作，依据家庭收入、支出及所占社会财富与资源情况，发布了《2010 年中产阶级》研究报告。报告数据显示，约旦中产阶级处于萎缩状态，由 2008 年占居民总数的 41% 下降至 29%，减少了 12%。^② 2012 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委托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对约旦中产阶级开展调研，研究结果同样显示约旦中产阶级正在减少。由此可见，约旦中产阶级确实面临向下流动的危险。

社会中层向上流动困难与向下流动的风险引发了约旦社会的动荡。2009 年夏，约旦街头就出现游行抗议活动，但这些抗议活动都被定义为社会暴力事件，如码头工人事件、教师运动和退伍军人运动。在中东变局初期，约旦中产阶级首先于 2011 年 1 月组织了约有 3,500 人参加的抗议游行，参加者主要来自穆斯林兄弟会、工会和一些反对派政党；同年 2 月，约旦又爆发由伊斯兰行动阵线以及其他 19 个政党联合组织的抗议活动，这次活动有约 7,000 人至 10,000 人参加。随后，首都安曼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约有 5 万人参加。约旦中产阶级是游行抗议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要求限制食品、燃料价格，提高工资待遇以及解决失业问题。但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考量，约旦中产阶级因顾虑革命失败后遭受损失或革命成功后既得利益难保而最终退缩。

第三，部落与家族势力仍是约旦政权的稳定支持者。2011 年 10 月，数千名萨赫尔部落成员聚集在王宫前，举行支持国王的游行；与此同时，其余部落及部落领导均表示对国王效忠。依托稳定的社会结构，约旦基本平稳渡过了中东剧变的冲击，这表明约旦政权具有一定的韧性与稳定性。

近年来，约旦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努力发展经济，抑制通货膨胀。但约旦经济增长率并不高，难以依靠现有经济增长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此外，约旦国内民众对部落与大家族上层通过买卖选票、伪造选票等方式操控选举的质疑不绝于耳，约旦社会结构面临进一步改革与调整。

^① [约旦]艾哈迈德·扎卡里亚·绥亚姆：《约旦通货膨胀及其对约旦居民的影响》（阿拉伯文），载《中东研究期刊》2014 年第 67 期，第 126 页。

^② [约旦]穆罕默德·阿克法·赫里塞特：《缩减中的约旦中产阶级》（阿拉伯文），明日网，2014 年 6 月 15 日，<http://www.alghad.com/articles/808309>，登录时间：2018 年 11 月 2 日。

五、结论

在约旦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结构在向现代社会结构渗透的过程中基本上实现了等级与阶层的匹配与平衡。通过王室与部落联合,传统部落与家族领导层成为现代社会上层,并实现了上层权力的内部传承。传统部落民依靠家族与部落势力,依据亲缘与血缘关系,获取了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却在身份地位的代际传递过程中困难重重。巴勒斯坦难民在向约旦国民身份转变的过程中,身份与社会地位出现落差,使约旦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在约旦的现代化政策与海湾石油经济发展的带动下,社会中下层向上的流动渠道被打开。然而,约旦民主制度发展有限,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社会中层向下流动的风险日益增加,且中产阶层的保守性和局限性使其难以放弃既得利益与社会地位,推动激进的社会变革。

总体而言,约旦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利用了传统社会的力量,构筑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借助教育和外部经济环境,壮大了中产阶层的力量。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变化对世界上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社会稳定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因社会结构受传统因素影响显著,约旦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社会阶层处于向上流动机会不足与向下流动压力增加的困境,使社会蕴藏着潜在危机。因此,约旦社会结构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与改革,约旦王室与政府需在维护王室与部落联盟的基础上推进民主的发展与进步,妥善处理巴勒斯坦人问题,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及国家发展愿景。

(责任编辑:章远 责任校对:赵军)